

不 定 的 号 角

〔美〕 马克斯威尔·泰勒 著

王 群 译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THE UNCERTAIN TRUMPET

Maxwell D. Taylor

General, U.S. Army (Retired) A

Chief of Staff, 1955—1959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Harper & Brothers, N.Y.

不定的号角

马克斯威尔·泰勒著

王 群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5 3/4·字数100,000

1963年1月第一版（北京）

1964年5月第二次印刷

1985年2月第三次印刷（沈阳）

书号：5185·53 定价：1.25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极端荒谬的论点	(6)
第二章 大规模报复原则的产生	(15)
第三章 新面貌政策在实施中 (1953—1956)	(25)
第四章 “新面貌”衰老了 (1956—1959)	(46)
第五章 军事战略的制定——理论方面	(73)
第六章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	(80)
第七章 决策的失败：军事战略实 际上是如何制订的	(102)
第八章 灵活反应——新的国家军事计划	(114)
第九章 号声响亮的新军号	(144)
附 录	(157)
后 记	(172)

前 言

在1944年6月6日——登陆诺曼第以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那些指挥美军空降突击的人，对于德国人在诺曼第我们预定使用的伞降与滑翔机着陆区内所进行的各种新活动，深感不安。每天对该地带所拍摄的航空照片都显示了新构筑的防御工事，这些工事显然是用来抵抗空降攻击的。照片判读员告诉我们说，那些工事主要是用直径约8吋、高度为8呎的杆子构成的。这些杆子按照密集的跳棋盘型式竖插在诺曼第的许多块农田上。我们马上想到，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种插杆的形式，也许就可以判断德国人的防御计划；至少可以知道他们预计我们是如何降落的。

我们每夜都在英国伯克郡纽伯利我的师司令部里仔细研究那些拍摄的照片。但是，尽管做了各种尝试，我们仍然不能在这些插杆活动中，发现任何有意义的插杆型式。到处都竖插着杆子，但没有证据表明，德国人在选择插杆地点或确定某一地区应先于其它地区完成工事构筑方面，有任何计划。因此，我们仍然怀着对德国人的企图和部署困惑不解的心情，于6月5日黄昏乘飞机起飞了。

在进攻欧洲大陆开始日的早晨，我在朦胧的天色中，同连续投下之伞兵一起着陆。接着我就集结了少量的部队，并包围了我们发现的第一座农舍。在获取了有关邻近地区德国人的情报后，我就向该农舍的农民询问其农田插杆的问题。

“我看到在你的屋子以西的那小块土地上插有杆子，而在屋子以东的那一大块土地上却没有杆子，这是什么道理？”

该农民答称：“哦，德国人要我们在6月15日之前在地里都插上杆子。我的牛从来都不喜欢西面那块地，所以我就先在那里插杆。”

就是这样。至少在这一特殊情况下，这个法国人的牛的爱好要比德国人的防御计划有更合理的根据。我猜疑德国人在整个诺曼第农村中都是同样没有计划的。这个故事有它诙谐的一面，但它提醒我们注意在军事计划与行动受非军事因素支配时将会发生的情况。那些随着法国牛的爱好而安插的杆子，对我们的着陆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

我着手写这本书，因为我确信，现在美国的防务大都受非军事因素或已经过时的因素的支配。在我卸去参谋长职务之后和将我的看法著书立说之前，应该有一段缓和的时期，虽然这是没有理由的。但我深深地感到时不待人。正当政治局势日益加剧之时，我们却面临我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削弱的事实。为了在这一趋势恶性发展之前及时予以

制止，就必须立即采取某些行动，即本书中所称的“应急措施”。要想永久地改变这一状况，要求我国政府的负责机构全面地重新估价我国的战略。如果本书能够提供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可能的方案，从而使这项重要的重新估价工作得以进行，那么，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在提出此问题时，我感到有必要稍微详细地谈谈国防预算的问题。国防预算似乎是一个单调乏味的话题，但是，如果预算能发挥其正当的作用，那么，它就远不是一项仅仅与财务人员有关的编制枯燥数字的工作。预算应为我们未来安全所赖的军事战略化为美元。由于预算所提供之基金将影响今后三、四年内的军事计划，所以，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内，预算也会妨碍我国领导人采取决定与行动的自由。因此，我们如欲改变处理防务的办法，那么，现在就应该来做，而不要让新的年度预算重蹈复辙，以至影响将来。如果我们的军号要发出不同的号声，现在该是重新调整音调的时候了。

我以前在五角大楼的同事们在本书中不会发现多少新的东西。在我担任参谋长的四年中，我曾在国防部中一再地提出过大部分看法和批评。一般说来，为避免引文不精确，我并不试图详细地记录那些与我持有不同意见的能干与爱国的同事们的相反的论点。不用说，在采纳我在本书中所建议的任何行动之前，那些同事们的观点值得极其认真地加以考虑。如果要使我们的战略需要得到最后的满

足，就需要三军所有的最有智慧的军人共同努力。

读者在书中某些地方可能感到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我在写作时不得不注意是否泄密或是否恰当的问题。由于这些考虑，所以就省略了一些情况，但我并不认为它们对于本书的主题是很重要的。

我本人对本书负责，但显然有许多能干的男女直接或间接给了帮助，我在同颖悟而勇敢的陆军部长布鲁克共事时，获益不浅。他为我们全体军人树立了一个文职领导人的榜样；他愿意承担责任并为他所信仰的任何事业顽强斗争。陆军参谋部中许多军官在本书所论述的重要问题上，对我的观点有所影响。对于我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它地方用来为我的主张辩护的那些论点，他们是热心的和锐敏的批评家。在我所许可的范围内，他们发挥了十全十美的参谋军官的作用，他们保证使“老头”所犯的错误不至过大又不过多。我同这些能干的人之间的令人鼓舞的共事关系乃是我担任参谋长职务时所获得的最高奖赏之一。

因此，不可能对许许多多在我写本书时给过我某种形式帮助的人士所作的贡献，一一致谢。但我不能不提到我的高级助手罗杰斯中校、普罗克透准尉与专业兵斯柯特。他们都是我的直属部下。我家庭的各个成员，特别是我的妻子利迪亚、我的儿子约翰·泰勒和媳妇普里西拉，在表达非职业军人的观点并为其辩护等方面，对我帮助极大。哈普尔兄弟出版公司的汤姆斯先生协助我进行了那项特别

艰巨的工作，这就是减少——如果不是消除——久居五角大楼的人的笔下所必用的技术术语和呆板的文字。

最近有人问我，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哪些东西对我作为参谋长是最有帮助的。是去指挥与参谋学院和陆军大学学习吗？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与马歇尔上将共同工作吗？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指挥空降第101师或在朝鲜指挥第8集团军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在入西点军校之前，我所参加的肯萨斯城的东北中学辩论会，是对我最有用的准备工作。”读者从以下各章中可以知道理由何在。

马克斯威尔·D·泰勒

第一章 极端荒谬的论点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担任空降第101师师长时所写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1945年7月28日。星期六。驱车前往贝赫特斯加登，与马歇尔将军和巴顿将军共进午餐。参加第二军的径赛运动会。后与马歇尔将军一起返回贝赫特斯加登别墅。第一次听到有关原子弹的消息”。

当时的背景是：德国投降时，空降第101师正在迅速越过巴伐利亚南部，并以贝赫特斯加登作为它的目标。贝赫特斯加登曾是希特勒的著名的休养地，它和柏林一起，在当时成了纳粹主义的最后象征。据说这个崎岖的山区虽是坚固的防御堡垒，具有严密的组织和良好的防御工事，可以作殊死战，但却在美军步兵第3师、空降第101师和法军装甲第2师的联合攻击下迅速瓦解。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看到的敌人最后一次的射击，就是来自贝赫特斯加登西面山路的一挺德国机枪。

空降第101师一旦驻扎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这个风景区后，就开始接待许多著名的访客。有些是德国的领导人，

是在苏军向东进军时逃出来的。他们来时非常匆忙。例如，驻意大利德军司令凯塞林元帅，伟大的德国装甲兵统帅古德林将军以及其他许多职位较低的人物都投到我们空降师这里来。其他的访客则来得较为悠闲，他们都是美国或盟国的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在1945年7月下旬得悉马歇尔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在陆军部参谋部任职时，曾在他的麾下服务——将在波茨坦会议后前来访问我们时，我真是高兴极了。当时他带口信给我说，他希望在贝赫特斯加登安静地休养。但愿与巴顿将军共进午餐。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司令部当时设在我师驻地以西约70哩处的巴达杜斯。

我把马歇尔将军的愿望转达给了巴顿将军并按时前往萨尔斯堡机场去迎接参谋长。当他下机后，我把他带到贝赫特斯加登别墅，并将他安置在一所过去经常有纳粹要人居住的公寓里。巴顿将军则在午餐前赶到。于是，我们三人静悄悄地在马歇尔将军的套房里进餐。饭后当谈话的内容转向波茨坦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时，我把这两位贵客引到了当地的运动场上。在那里，第2军和我师的运动员正在举行径赛。在巴伐利亚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我们三人与其他观众保持一段距离。在休息的时候，马歇尔将军转过来对巴顿将军和我说，“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极端重要的事情。你们听到这些事情后，我就毋需提醒你们关于

保守秘密的需要了。”

接着，马歇尔将军开始告诉我们一个以前我们毫不知道的故事：十二天之前（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哥多爆炸了第一枚原子武器。他简单地阐述了在小格罗夫斯少将领导下的曼汉坦地区的发展情况、小格罗夫斯及其同事所克服的重重困难以及终于胜利地爆炸了原子武器的情况。他开玩笑地解释说——我想这使我们更加迷惑不解——，这并不是一次“爆炸”，而是一次“内破裂”。

马歇尔将军在叙述了爆炸的巨大威力以及它在军事上的含义后，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这次谈话：“先生们，在八月第一个月明的晚上，我们将把其中的一枚原子弹投在日本人头上，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投掷两枚以上。”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

巴顿将军和我默默相对，仔细地领会马歇尔将军谈话的可怕的含义。至少，我在当时力图设想这些武器对太平洋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接着，又猜测这些武器对未来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用这些武器在欧洲开辟进攻的道路，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的成千名勇敢的士兵可能因此而得救，的确，我认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武器，它可以保持和平，并使墨索里尼或希特勒之流永远不敢利用战争来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自由世界。

至少这些就是我当时的想法。至于巴顿将军的想法，我是永远不会知道了，因为这是我和他在他死前的最后

一次会面。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俩人都感受了这一荒谬的论点的魅力，认为使用或威胁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原子武器，就足以保障美国及其友邦的安全。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着说明这种想法确实是一种谬见。

不久以后，历史就证明了马歇尔将军关于原子武器对日本影响的估计是正确的。两颗原子弹确实结束了对日战争。日本投降了，胜利赢得了，原子时代也来到了。整个世界比贝赫特斯加登径赛运动会上的将军们更加深刻地感到美国手中新武器的可怕威力。这使我国人民很快认识到我们武装部队掌握的空中投掷的原子弹是绝对的武器，可以使独占这些武器的国家——美国——能够通过威胁使用它而维持世界的秩序。这样，一种新的战略原则——最后称为大规模报复政策——就在1945年出现了；并在1953年我国政府采纳的所谓新面貌计划中，作为一种正统的军事思想而被完全接受。在其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曾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遇到了挫折，因为这次战争违反了它的许多基本假设。但是它继续存在，而且即使在本书谈到的一些变迁中，也继续发展成长。大规模报复政策有时尽管暂时受到挫折，但仍然是指导我们目前军事准备的基本战略原则。国防问题的发言人虽然有时也反对无条件信仰大规模报复政策，但这种信仰却反映在每年军事预算的数字中。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而且尽管朝鲜战争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国防费用首先还是用来满足大规模报复政策和原

子大战的要求。俗语说：“不惜为珍视的东西耗尽心血。”

我认为，大规模报复政策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来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因此，目前迫切需要重新衡量我们的战略需要。在大规模报复政策的全盛时期，它只能使我们领导人面临这样两种抉择：发动核大战或谋求妥协和退却。从最初制定大规模报复政策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事。这些事件对大规模报复政策的有效性投下了阴影，同时也揭露了它的虚伪性。朝鲜战争是在我国垄断原子武器的时期内进行的一场有限的常规战争，但它却清楚地说明了这项政策并不是普遍适用的。1945年以来的其它许多有限战争——中国的内战、希腊和马来亚的游击战、越南战争、台湾事件、匈牙利事件、中东战争、老挝战争等等——，也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阻止了大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却未能保持住“小和平”，即没有消除局部地区的骚动。

其他的一些事件也要求我们重新衡量我们的军事战略。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原子武器的垄断。我们的弹道导弹的数量可能比苏联少。但我们没有反导弹导弹来抵销苏联的优势。我们并没有在抵抗共产党的地面力量方面作出现实的努力。我们的许多军事联盟正在遭受“贫血症”的折磨。我们正在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比赛。因此，应当设法加以改变。但是，由于我们制定战略的机构和方法还存在着缺

点，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是困难的。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缺乏效率，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变，以便作为我们全面地重新衡量战略的前奏。

因此，我建议用“灵活反应的战略”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这种战略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各种规模的挑战，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战争，从核大战到诸如1955年威胁老挝和柏林之类的渗透和侵略。这项新的战略承认，遏制或迅速赢得有限战争和遏制大战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赢得局部战争，就会遭到蚕食；或者投入一场日益扩大的冲突，而这场冲突是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大家都希望避免的大战的。

为了在战略方面进行这样的改变，就必须进行许多工作。首先，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国防部下达明确的指示。其次，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这项指示确定军事需要的先后顺序。最后，它也要求编造新的国防预算，以确保国防费用能够根据批准的（军事）需要的先后顺序加以分配。这几项行动结合在一起，就成了“灵活反应的军事计划”。这样一种计划是为了克服我们在1961——64年期间在军事上的严重不利情况所必需的。

为了对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就需要在讨论开始时对某些基本术语的含义，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大战”和“有限战争”这两个术语早已需要给予一个定义了。我在本书的前一部分，将按政府制定战略的人员目

前所下的定义来使用这两个术语。但是应当讲清楚，我并不同意他们对这两个术语所下的定义；我在此后发表的意见中将会说明这点。但为了便于目前的讨论，“大战”指的是美苏部队直接牵涉进去的，而且在战争一开始就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另一方面，“有限战争”指的是尚未达到大战程度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美国的武装部队将根据实现国家目标的需要去使用原子武器。赞成这些定义的人们也认为，这些局部性的冲突可能在欧洲以外的、比较不发达的地区爆发；而美国只需用有限的部队就能应付。

这些定义只是在经过了非常激烈的辩论后才在官员中间流传开来的。我们正在为修改这些定义进行努力。反对“大战”定义的人们认为，这样一来，一当美苏两国部队交锋时，不管这种冲突的规模多大，也不管它的政治重要性如何，看来我们就必须发起全面的原子轰炸。对定义的这种讨论，并不是生硬无味的，而是有其实际效果的。例如，坚持这样的定义，就会在出现苏联或其盟国封锁我们去柏林的通道的情况时，使我们不能为此而制定合理的对策。在计划应付这种紧急事件时，就可以用这种定义作为理由，反对美国用地面部队刺探苏联的意图，和避免因苏联的虚声恫吓而撤出柏林的可能性。由于这种行动可能使美国部队和苏联部队发生武装冲突，因此，它就可能导致大战的爆发——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大战的定义的话。可是，具有常识的人会说，我们并没有严肃地对待大战的定

义。但是，既然它仍是战略制定人的正式用语，那么，除非另有注明，否则我将沿用这一定义。

关于“有限战争”的定义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似乎排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管辖的西欧地区内进行任何有限战争的可能性。这一理由经常在五角大楼的辩论中被提出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曾经爆发过一次有限战争，即1947年的希腊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曾在提供军事顾问和军事装备方面，作了重大的贡献，即使美国在当时垄断了原子武器，也没有人建议使用这种武器和把局部性的敌对行动扩大成为大战。局部战争的定义中所隐藏着的“小规模”的含义，是应该遭到反对的，因为这种含义可以被用来阻止武装部队策划比1958年黎巴嫩登陆还多得多的事件。这种含义甚至还使它的积极拥护者否认把朝鲜冲突说成是有限战争，尽管这一战争在地理、武器和政治目标方面都有其显著的局限性。

这两个定义都促使武装部队对原子武器的依赖达到了值得怀疑的地步。在大战中，原子武器将立即使用；在有限战争中，则将根据国家的利益使用之。目前虽然没有机会来检验这一假设在大战中的有效性，但是有意义的事情是，在1958年的黎巴嫩登陆中，美国陆军的诚实约翰火箭配置在贝鲁特港口外，但不准上陆，因为它既能发射原子弹头又能发射常规弹头。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的政治领袖认为，即使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而显示了我們有可能使用原

子武器时，也是对我国不利的。此外，这两个定义中所包含的大战将会带来突然的毁灭、而有限战争相对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论点也被用来做为一种理由，以资反对保持为进行长时期军事活动所需的训练有素的预备人员和备份的军事装备。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这些定义规定了军事战略的面貌。它们是被用来为大规模报复战略辩护的，同时又排除了考虑常规战争的需要。为了解释存在这种定义的原因，现在必须回顾一下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演变过程及其产生的思想背景。